

“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

The No Name : A History of A Self-Exiled Avant-Garde



高名潞 主编 Gao Minglu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是第一个在野的艺术团体。它比星星画会更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与“文革”艺术反其道而行之，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多年来，这些艺术家默默地作画，很少参与公开的艺术活动。另一方面，这些艺术家的“纯艺术”观念也和过去二十年注重社会性的时尚艺术思潮不相符。所以，直至今日，人们对无名画会仍很陌生，无名画会的活动历史、艺术家成员、他们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观更是鲜为人知。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中国当代前卫和现代艺术的起源问题。本书试图重新还原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历史，揭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文革”政治艺术所遮蔽和被当代美术史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无名画会的活动是在未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及艺术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这与20世纪80年代后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影响的前卫艺术很不一样。我们应如何看待无名画会的那些非政治和无社会性题材的“纯艺术”作品？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某些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独立”的派生物？还是应当把它们放到中国具体的现代性情境中去解读？如果从本土情境去看，无名画会“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其实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无名画会的理念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对



政治时尚和物质时尚都拒斥的反媚俗的现象。无名画会拒绝媚俗的信念和创作是他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变迁的反应和抵抗。在“文革”中，这类非政治的、“纯艺术”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所以，他们是与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合逻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前卫艺术中的另类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艺术实践本身其实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无名画会所倡导的“媚俗”和“反媚俗”的文化意义和复杂关系需要放到中国本土的现代性逻辑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去解读。这种现代性的视角还会引申出现代艺术家的主体性问题。无名画会的主要价值是个体的、精英的。艺术对他们而言是宗教性的、陶冶性情的自我完善之路。所以，它又是一种超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艺术”的观念。这个个体的主体性与建立在社会变革和全球价值之上的社会主体性是现代性结构中的两翼。但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前者是被忽视的。社会现代性是主流，所以，它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和前卫性叙事的畸形和缺失。其结果

就是为文化殖民和全球化提供了可乘之机。

无名画会的主要创作是风景和写生，但不是为技术训练而作的习作，而是自然、自我和社会环境的统一和对话。写生的地点和无名画会活动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风景”就超出了通常的写生意义，而与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状态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风景”非景，是社会景观，这些“风景”因此不可能独立于它们所产生的全部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但是这种关系往往不能简单地从画面中解读出来，这需要我们对艺术家的生活和社会背景做深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试图对无名画会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客观、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促使人们在思考无名画会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要思考它在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性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画出人的天真、纯朴和东方情操。这些荷塘不但是一种自我宣照，同时也是对决不与“浑恶”（恶劣的生人和政治环境）为伍的表白。如果我们超越这“荷塘”的画面之美，进入到当时的“恶劣的‘文革’”政治生态中，我们就会理解这些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人生能画得出来的大天直地而清秀的“荷塘”。“文革”时期是政治污染，今天是商业污染，两种污染同样可怕。而在西方艺术中，“风景”的意思有点像中国的“山水”。但是，在20世纪初，当风景画随着西方绘画引进中国以后，中国人对风景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风景写生”上。这是大概因为“通真”的三度空间感给了中国人更多“科学”和“真实”的意味。所以，中国人认为风景必定是“风景写生”的产物，尽管在西方很多风景并不是对景写生而是想象创作出来的。由于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在日本的深刻影响，风景画的题材也成为了中国艺术家“笔耕”的话据日本时期的“油画艺术”的主要题材之一。比如，以留日艺术家为主体的决澜社创作的作品中就有很多风景画。当然，留法的艺术家如刘海粟、林风眠等人也创造了很多风景画。但是，相对于以社会和政治题材为主的个人画而言，风景画似乎是唯美和现代主义的附属品。在中国20世纪的艺术潮流之中，它是边缘的，非主流的。只是在20世纪早期和“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才被为所关注的题材。所以，今天当我们谈论无名画家时，他们的作品中，虽然也常常存在“文革”的痕迹的倾向，但是，

的历史时，我们必然发现“文革”的审美时间、空间和历史的脉络。但“文革”画会没有追随政治时尚，而是按照自己的艺术理念，创作了一大批“风景”。这种理念，如前所述，是前卫性的，也是反传统的。因为，同样的追求和题材，几年以后才在中国画坛上被公开地推崇为公开的时尚。其次，无名画会的“风景”是对现实主义的厌恶和对古代艺术理想的渴望，是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尽管在“文革”时期这种诉求是微弱、无力的，甚至可能是艺术家想象中的现代主义。不论是出于有意识，还是出于无意识，“无名”的风景都向我们展示了隐藏在“风景”背后的并非单纯风景的社会主义的一面。面对这一意义的发现，需要我们超越画面的“风景”之景，把那些本身【文本、Text】和艺术家作画时的社会情境【上文、Context】当作一个不可分割、互补的有机整体去理解，而不是把二者截然分离。

无名的“风景”画之“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对“无名”而言，“景”意味着“画”和“工作室”，重点是他们最自由的艺术活动空间。无名画会经常说“风景写生”完全是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的对抗。因为那个时候，风景，特别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艺术，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的艺术都被批判和禁止。那个时候，到哪“景点”去写生，很大程度上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风景画在艺术家们个人风格、趣味、是因为他们必须到户外去作画，到室内画面“写生”对“无名”艺术家来说也最少麻烦，同时个人集体作画更能提供一种在个人孤独状态中不能享受的自由和相互支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集体不仅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虚幻的观念，它可以给个体“犯错误”的勇气和提供直被压抑的个体潜意识和个体情感的空间和语境。所以，“集体写生”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就是一种政治的代名词。在“文革”前的60年代和“文革”之中，“革命”的艺术家们既可以在“文革”氛围笼罩的美术学院和群众文化馆之中进行“创作”，也可以在大街上画革命画，像革命老人、相反，一个“无名”的青年在邻里聚集的家中画画，就是“反动”的。无名画会的那些“风景”正是一个正常人注目和欣赏正常的事件，在“文革”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时的政治形势下，如果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正在工作（比如，在工厂或者机关的工作），那就会被称作“社青”。“社青”，意思是不务正业的青年，从60年代初开始，政府就开始把这些“社青”送到青海、甘肃等边疆地区，闲居在画家画室，特别是画那些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怪画”，不但不会受到街道委员会的经济“照顾”，反而可能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帽子，甚至招致更可怕的结局。实际上，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等人常常遇到很多麻烦。赵文量和杨雨澍初中毕业后，报考美术学校，但是，他们常常被邻居和街道干部监视、询问，所以，常常不敢在家画画，只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写生。这就是名画“风景”最初的社会学起源。所以，“风景”写实是无名画会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的逃离、同时，也是以“善”的心地和“美”的艺术的拯救。这种信念始终是名画会艺术家的追求。

其次，“风景”对于无名画会而言，是一种观念，它既不是



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景点，这其中的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无名画会所选择的“风景”点构成了无名画会的历史。所以，无名画会的活动和发展过程完全可以按照北京的地点和景点的变化去划分。于是，我们可以按照景点把无名画会的历程分成三个阶段。



的形成阶段：1974年至1978年，为无名画会的壮大阶段，也就是“玉渊潭画派”的活动阶段；1979年至80年代，这是无名画会的展览活动期。



大自然的实体现实，也是大自然的精神象征。所以，他的“风景”不是景，是他们眼中的理想世界。它和那充满阶级斗争的现实世界是对立的，和世人是对立的。人被排除在这个世界外，因为，人的世界是被扭曲的、利的、贪婪的，所以，他们要远离人世，到大自然中找原初的人性，找回人性的纯洁和天真。按杨雨澍的说，就是要“弃恶就善”。在他们眼中，“文革”中的些画都是恶，是虚伪。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风景”意念和传统的文人山水画的观念十分接近。也就是说，他们在风景中再造了一个田园化的乌托邦。即便是画人物，他们也大多只画自己群体里的人，或者他们是敬的人。就像元代文人画的山水，元人一改宋人山水画都要画人以表现“可游可居”的时尚，不画俗人，只画渔樵。倪瓒山水从不画人，而吴镇山水中只有樵夫【画家自己的隐士精神的写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无名”的“景”虽然是理想的，但绝非一种现实无关的幻境，它们仍然是现世的，“无名”家“风景”里的“景点”，比如，十三陵、香山、玉渊潭、什刹海、紫竹院等，都不是他们和我们无关的，临时被选择写生对象，而是与他们的艺术活动紧密相关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象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历史的见证。所以，他们

一个地点成为了这一阶段无名画会活动的据点，其中一个就是钓鱼台。
1958年赵文量第一次去钓鱼台写生，“无名”的户外写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此。在这次写生经历中，赵文量坚定了一个信念，他坚信，不进美术学院，靠自学，也能搞艺术。在早期阶段中，“无名”艺术家不仅到钓鱼台，也经常到更远的郊外山、十三陵、八达岭等地“写生”，但这些都是从钓鱼台开始的。到了“文革”后期阶段，更多的艺术家加入“无名”的行列，钓鱼台就成了“无名”的写生据点，[后来渐渐转至紫竹院]，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可以说把钓鱼台作为“无名”在开始阶段的实际活动地和象征。



ISBN 978-7-5633-6398-8



10

9 787563 363988 >

[ISBN 078-7-5623-620

J209.2
22

2007

“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

The No Name : A History of A Self-Exiled Avant-Garde

高名潞 主编

Gao Mingl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 / 高名潞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633-6398-8

I . 无… II . 高… III . 绘画 – 艺术 – 团体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06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787mm × 1 092 1/16

印张：35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高名潞

“无名画会”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第一个在野画会。虽然我对无名画会早就有所了解，并且在中国和美国都和一些无名画会的艺术家有联系交流，但是，对无名画会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在野画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直是我的长期心愿。1970年代末，我看很多画会的展览，如“新春美展”、“星星”、“同代人”、“紫罗兰”和“北京油画研究会”，等等。但是唯独1979年7月举办的无名画会第一次展览没有赶上，因为那时我奔波在内蒙古和天津美术学院之间。读研究生时又全部沉浸到古代艺术史之中。毕业后到《美术》杂志，于是投入到“85美术运动”，根本无暇回头去关注“文革”时期的地下艺术。1992年我在纽约见到无名画会的张伟。1993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我碰到在历史系读博士的无名画会的艺术家王爱和。我们谈起了无名画会。有一天，在她波士顿的家里，她从箱子里取出了保存多年的幻灯片。其中大部分是她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张无名年代的照片。我看后很感动：有才气，有真情。她的作品和85时期的群体艺术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类似，就是都有一种诚挚和真情那样的最能打动人东西。那时我就和

王爱和说，等将来有机会，我要把无名画会的历史整理介绍出来，把那些“文革”中的作品展示给公众。90年代中，我在香港和北京见到小说家马建。他给了我一篇他写关于无名画会的文章。他反复向我强调，无名画会是比“星星”还要早的中国第一个在野画会。他试图说服我为无名画会的历史研究做些工作。后来，当我在纽约策划美国第一次大型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Inside Out 的时候，我曾经想到是否在我的展览中包括早期的在野画会和“文革”期间和“文革”刚结束的艺术作品。但是，最后展览的作品还是从1980年代中开始。一个重要的原因让我改变想法：当我策划Inside Out时，纽约古根海姆的“中国艺术五千年”展览也在同时筹备。它也包括中国当代艺术部分，特别是“文革”和“文革”刚刚结束直到19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艺术。因为内容上的冲突和寻找那个时代的作品很不方便等，我就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是我在对中国当代美术历史的描述中，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始放到了“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对无名画会尚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所以，没有描述无名画会的历史。至今我仍然

非常遗憾。后来在纽约见到了无名画会的马可鲁，我邀请他到我任教的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及建筑史系做了一个关于无名画会的讲演，很受欢迎。我记得马可鲁开车四个多小时到了我的住所后，坐下来没有喘口气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无名画会，从赵文量和杨雨澍谈起。我们畅谈了三天。我也谈到要做一个无名画会的回顾展，把无名画会的历史整理出来的想法。马可鲁回去后不久就写出了五万余字的充满激情的诗史文字《无名年代》。今年，我终于可以坐下来和无名画会的画家们座谈，畅谈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艺术观。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同代人，都是从“文革”上山下乡走过来的。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我和我的几位助手还分别访问了在北京的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图001—图005] [其实就是他们的家]，包括赵文量、杨雨澍、石振宇、马可鲁、李珊、韦海、郑子燕等人。遗憾的是，无名画会的一名重要艺术家史习习已经在去年去世。看着他们一个个饱经沧桑的面孔、存放多年积满尘土的作品和那些历史照片，我深深感到我所做的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当代艺术研究和展览策划，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当代美术的一段重要历史，一段被忽略的历史的抢救。因为，无名画会的史习习已经离开了人世。因此，我希望借这次机会，把无名画会的历史材料充

分梳理一下，并对无名画会的创作背景和意义进行分析和讨论，供研究者参考批评。

今年，由于我有相对空闲的学术研究时间，我和助手在一个夏季里，在北京走访了十几位无名画会的主要成员，进行调查访谈。不但搜集编纂了“无名”的历史文献，同时还举办了无名画会的回顾展。我们将文献编纂成这本书，奉献给读者和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调查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和当初我所接触的“85 美术运动”的艺术家不一样，无名画会的艺术家主要用画而不是语言去述说他们的艺术观和他们的历史。大量的“读画”工作也成为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和他们谈话与相处的过程中，得到互相了解并与他们结下了友谊。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我再次向所有为本书和“无名画会回顾展”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表示感谢。

首先，向无名画会的所有艺术家致意，对他们精诚合作的态度和对展览以及文献整理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特别是赵文量和杨雨澍两位先生，他们不顾劳累和病痛，全力配合我。无名画会的艺术家李珊作为联络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常常跑东跑西进行联络。在本书编辑的最后阶段，她投入大量时间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她。不仅因为她的勤快努力，更因为她为人

热情、开朗和诚恳。非常感谢 Y.Q.K. 艺术中心的考云岐先生，以及 TRA 画廊的章晓红女士为这个展览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他们对艺术家的热情帮助和奉献。我也非常感谢广东美术馆的王璜生馆长以及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和证大现代艺术馆的沈其斌馆长对“无名画会回顾展”在广州和上海的巡回展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国际经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李国昌先生为我的助手们提供工作室使用，从而使这段紧张的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再次，我也感谢孙晓彤女士的热情支持。也感谢柯卫的翻译校对工作。

著名艺术家朱金石以及我的朋友冰逸在筹备过程中，与展览机构和艺术家之间做了

大量的协调和交流工作，我在此深表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四位助手盛葳、章润娟、王志亮和张丹纳。他们利用全部暑假的休息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展览和协助编辑本书的繁重工作。没有他们默默无闻和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本次展览和文献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特别感谢 Philip Taniry 翻译了我的总论《无名画会——拒绝媚俗的悲剧前卫》，并对全书的英文部分进行了校对。最后，我要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特别要感谢阳光谷的王联女士，谢谢她的热烈支持和严谨细致的编辑工作，从而使此书得以在短期内出版。

2006 年 9 月 12 日于北京

目 录

006	前 言	目击者评论
总 论		311 刘迅：因势利导，繁荣群众美术活动
011	高名潞：无名画会——拒绝媚俗的悲剧	315 高尔泰：“无名画展”印象记
	前卫	321 刘海粟：美在斯——谈几位青年无名画家的创作
历 史		347 马建：现代派艺术的开拓者——无名画会
141	无名画会的早期活动——高名潞和赵文量、杨雨澍的访谈	353 朱金石：优美的弦
163	无名画会与星星画会——高名潞和赵文量的访谈	图 版
175	三十年后看“无名”——无名画会成员座谈会纪要	360 记忆与想象
195	赵文量：对1979年无名画展的回忆	380 远郊
199	陶咏白：对1979年无名画展及研讨会的回忆和记录	408 玉渊潭
207	马可鲁：无名年代 [选摘]	438 什刹海
231	郑子燕：我对无名画会的回忆	460 家
255	无名画会活动年表	476 人物
		490 荷塘
		500 静物
		549 艺术家小传

CONTENTS

006	Preface	
Introduction		
095	Gao Minglu, The No Name Group: An Avant-Garde in Self-Exile from Kitsch	
History		
141	Gao Minglu, Early Activities of the No Name Group: An Interview with Zhao Wenliang and Yang Yushu	
163	Gao Minglu, The No Name and The Stars: An Interview with Zhao Wenliang	
175	Thirty-year Retrospect of the No Name: Summary of the No Name Conference	
195	Zhao Wenliang, Memoir of 1979 No Name Exhibition	
199	Tao Yongbai, Notice and Memory of 1979 No Name Exhibition and Conference	
207	Ma Kelu, Years of the No Name [selection]	
231	Zheng Ziyuan, My Memory of the No Name	
255	Chronology of the No Name Group's Activities	
		Witness Reviews
311	Liu Xun, Toward a Healthy Direction of Mass Art	
315	Gao Ertai, Notice on the No Name Exhibition	
321	Liu Haisu, Such a Beauty: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Several Anonymous Painters	
347	Ma Jian, Pioneers of Modern Art: The No Name Group	
353	Zhu Jinshi, Beautiful String	
		Plates
360	Memory and Imagination	
380	The Outer Suburbs	
408	Yuyuantan Lake	
438	Shichahai	
460	Home	
476	Portraits	
490	Lotus Pond	
500	Still Life	
549	Biographies of Artists	

无名画会 —— 拒绝媚俗的悲剧前卫

The No Name Group: An Avant-Garde in Self-Exile from Kitsch

高名潞

Gao Minglu

内容提要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是第一个在野的艺术团体。它比星星画会更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与“文革”艺术反其道而行之，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多年来，这些艺术家默默地作画，很少参与公开的艺术活动。另一方面，这些艺术家的“纯艺术”观念也和过去二十年注重社会性的时尚艺术思潮不相符。所以，直至今日，人们对无名画会仍很陌生，无名画会的活动历史、艺术家成员、他们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观更是鲜为人知。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关于中国当代前卫和现代艺术的起源问题。本书试图重新还原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历史，揭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文革”政治艺术所遮蔽和被当代美术史所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无名画会的活动是在未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及艺术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这与20世纪80年代后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影响的前卫艺术很不一样。

二、我们应如何看待无名画会的那些非政治和无社会性题材的“纯艺术”作品？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某些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独立”的派生物？还是应当把它们放到中国具体的现代性情境中去解读？如果从本土情境去看，无名画会“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其实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无名画会的理念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对政治时尚和物质时尚都拒斥的反媚俗的现象。无名画会拒绝媚俗的信念和创作是他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变迁的反应和抵抗。在“文革”中，这类非政治的、“纯艺术”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所

以，他们是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合逻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前卫艺术中的另类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艺术实践本身其实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无名画会所启示的“媚俗”和“反媚俗”的文化意义和复杂关系需要放到中国本土的现代性逻辑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去解读。

三、这种现代性的视角还会引申出现代艺术家的主体性问题。无名画会的主体价值是个体的、精英的。艺术对他们而言是宗教性的、陶冶性情的自我完善之路。所以，它又是一种超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艺术”的观念。这种个体完善的主体性与建立在社会变革和全球价值之上的社会主体性是现代性结构中的两翼。但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前者是被忽视的。社会现代性是主流。所以，它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和前卫性叙事的畸形和缺失。其结果就是为文化殖民和全球化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无名画会的主要创作是风景和写生，但不是为技术训练而作的习作，而是自然、自我和社会环境的统一和对话。写生的地点和无名画会活动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风景”就超出了通常的写生意义，而与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状态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风景”非景，是社会景观，这些“风景”因此不可能独立于它们所产生的全部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但是这种关系往往不能简单地从画面中解读出来，这需要我们对艺术家的生活和社会背景做深入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试图对无名画会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客观、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促使人们在思考无名画会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要思考它在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性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是第一个在野的艺术团体。它比星星画会更早。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无名画会的活动也是跨度最长〔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群体。其主要成员赵文量、杨雨澍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从事现代艺术创作，即便是在“文革”期间，他们仍然不顾环境的恶劣，与“文革”艺术反其道而行之，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虽然，“无名画会”这个名称正式出现是在1979年，主要是为了1979年7月7日开幕的第一次展览，但往前追溯，无名画会的历史甚至可以1959年赵文量和杨雨澍在熙化美术学校结识为起点，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合作中，他们二人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无名画会的导师和灵魂人物。赵文量、杨雨澍，还有1962年先后结识的张达安、石振宇，他们共同形成了无名画会最初的中坚，他们的活动也奠定了无名画会的基本理念和活动方式。[图001]

1973年后，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无名画会的团队中，集合了张伟、李珊、马可鲁、史习习、王爱和、韦海、郑子燕、刘是、田淑英等一大批正直而富有才华的艺术青年，形成人们称之为“玉渊潭画派”的绘画群体。在赵文量和杨雨澍的组织下，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们常在周末或假期相邀出游写生，最多时，人数可达二十余人。1979年和



图001 写生途中，徐延宗、赵文量、石振宇〔前排左起〕，赵文量女儿、杨雨澍、赵文量侄子〔后排左起〕，1965年，石振宇提供图片

1981年，无名画会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公开画展，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较为集中的、公开展示无名画会作品的展览。尽管无名画会在1979年7月7日举办的第一次展览要比星星画会早三个月，而且所有参展艺术家在理念上较之星星画会更为统一和纯粹，且引起了刘海粟的高度重视并写下了洋洋万言，称赞其艺术精神，但是，无名画会的艺术活动及理念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很快忘却。虽然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同代人、新春画会等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都很有影响，但星星画会的展览由于政治上的影响，而成为了中国当代美术史所认可的第一个前卫艺术展览。^[1]而对于无名画会而言，直到1994年，韦海才在北京当代美术馆举办个展，2004年，赵文量和杨雨澍的联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2006年北

[1] 关于“星星画会”的集中材料见香港汉雅轩编辑发表的《星星十年》，1989年出版。关于“文革”后的画会活动介绍，见高名潞等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33页。



图 002 高名潞与助手章润娟在赵文量、杨雨澍家观看有关无名画会的录像资料，2006年8月9日，张丹纳摄



图 003 赵文量和高名潞的助手在德山艺术中心，2006年，8月12日，盛葳摄



图 004 高名潞与助手章润娟在李珊工作室，2006年8月19日，王志亮摄



图 005 赵文量、杨雨澍北京方庄芳古园家，2006年8月9日，张丹纳摄

京 TRA 画廊相继组织了李珊、张伟和马可鲁这三位无名画会成员的个展。但是，人们对无名画会仍很陌生。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家曾写过一些评论，^[2] 无名画会的活动历史、艺术家成员及其艺术作品和艺术观，仍然鲜为人知。

[2] 见刘海粟：《美在斯》，《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77—400页。其他重要评论有高爾泰：《“无名画展”印象记》，《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107页；马建：《现代派绘画的开拓者——无名画会》，原载《大趋势》杂志，香港，年代不详；后收录于马建：《人生伴侣》诗歌散文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1月，第24至32页。栗宪庭：《再访赵文量和杨雨澍》，《新潮》，2001年第8期，第73—78页；许和州：《赵文量、杨雨澍——边缘守望》，《边缘》，2004年2月，第97—111页。

一、“无名”的前卫意义

从赵文量1956年开始画他的第一件风景作品至今，约半个世纪，无论社会政治和经济如何变化，无名画会从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关注。他们既没有获得政治上的殊荣，也没有商业上的成功。然而他们不计得失，仍然坚持最初的理念和理想。今年，当我坐在赵文量和杨雨澍的住所 [同时也是“画室”] 的时候，我看到屋子里到处都挤满了画，上千张画，一排排的，层层叠叠，已堆到了屋顶，连走路都得极为小心，否则就有可能碰到画。屋子里仅有的家具，两张单人床被挤到角落，成为客人的“座椅”。这和今天到处可见的巨大的艺术家工作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贫困“潦倒”令人非常感伤。[图 002—图 005] 但是，赵文量、杨雨澍没有丝毫窘迫和焦虑，相反，非常淡然、平和和自信。难怪有人称他们为当代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就是既不媚政治之俗，也不媚商业时尚之俗。虽然，半个世纪的修炼使赵文量、杨雨澍的个人人格得到了自我完善，但是，作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我们的艺术史研究中，对无名画会悲剧性命运的关注不能说不存在严重缺失。“无名”不仅仅是一个画会的个案问题，它涉及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整体



图 006 杨雨澍，1970 年代中期，赵文量提供图片



图 009 颐和园谐趣园，1970 年代中期，郑子燕提供图片

图 007 赵文量以石振宇为模特进行绘画，1970 年代，赵文量提供图片



图 008 马可鲁，《谐趣园》，1975 年，纸上油画，
26cm × 19.6cm

叙事的全部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无名画会都可以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前卫艺术群体。首先，他们不向政治献媚。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他们敢于用“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反对“文革”的意识形态艺术。在无名画会艺术家的眼中，那些看似无主题的风景和静物才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在其中，他们可以寄托自己对真、善、美的真实理解。要知道，这种无主题或非政治主题的风景、静物和人物写生直到“文革”结束后两年，即 1978 年，才在上海的“十二人画展”上出现。[图 006—图 009] 而在北京，直到 1979 年，这类无主题绘画才在“新春画展”以及“同代人”、“紫罗兰”和“北京油画研究会”的展览中出现。当人们从“文革”的禁欲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很多艺术家开始拥抱“纯艺术”，甚至那些往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匠”们也转向了“为艺术而艺术”。但是，这个时候的“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化大革命”中无名画会的“为艺术而艺术”完全是两回事。“无名”的纯艺术观念是一开始就确定并始终坚持的信念，其纯艺术是反政治、反学院的，而前者则是时尚，是旧的意识形态艺术向“学院主义”的转型。令人悲哀的是，“无名”总是不在时尚之中，它永远处于边缘，“文革”中它是



图 010 赵文量，《八月十八日》，1966 年，包装盒纸，21.3cm × 18.2cm，画于长陵外官墙

边缘，“文革”后仍是边缘，在全球艺术市场火热的今天，它还是边缘。然而，只有边缘才是前卫艺术的真正品质。

从无名画会自身去寻找造成这种局面的背景，其原因恐怕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他们坚持古典的真、善、美的审美境界，这和或者以社会题材、或者以视觉刺激为审美标准的中国当代艺术显得格格不入；二是他们对任何形式的[集权政治的或流行时尚的]媚俗均予以排斥，不屑一顾。不论外部的政治形势

如何变化，他们始终坚信艺术是拯救灵魂的最有效手段。

无名画会又是精英的艺术。他们不主张艺术是为了拯救和教育大众，而认为艺术首先要拯救自己，艺术创作是为了自我完善。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无名”的前卫品质与中国的“正统前卫”，或者说“时尚前卫”的差异在于他们不关心政治。据此，人们会说，星星画会和“政治波普”以及“玩世现实主义”的政治性才是中国前卫艺术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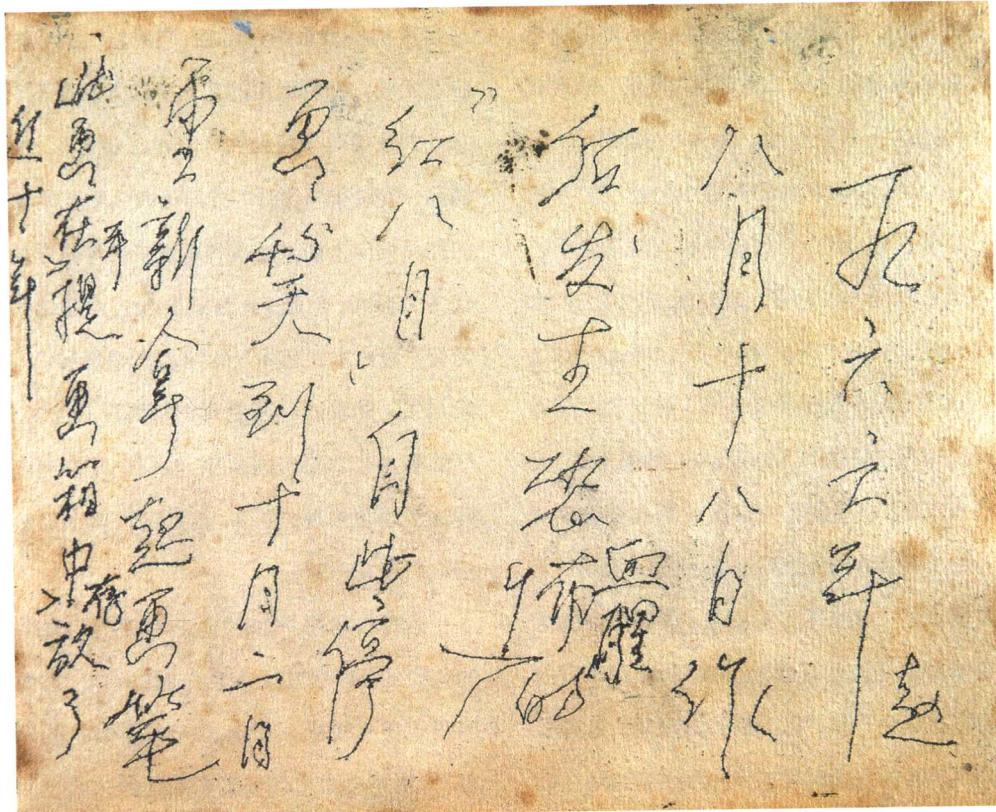


图 011 赵文量,《八月十八日》,1966 年, 包装盒纸, 21.3cm × 18.2cm, 画于长陵外官墙, 背面

主要的责任和特色，而“无名”的“为艺术而艺术”则不能称之为前卫。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艺术的直接内容，而是从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角度去检验无名画会，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对“文革”政治和艺术的抵触和对抗。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那天，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并没有像全中国人民那样都“沉浸到革命盛大节日的兴奋之中”，而是远离北京中心，全天都在北京郊外写生。正如，

赵文量在《八月十八日》的那张风景画的背面写下的文字所说：“此画作完后，发生恐怖血腥的‘红八日’。我停画四十五天。到十月二日重新拿起画笔。此画在手提箱中存放了近十年。”[图 010—图 011] 又比如，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无名画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到天安门广场，有些还直接参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和警察对抗，并用摄影等形式记录了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好几位无名画会的艺术家后来都创作了这一题